

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

周群

内容提要: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建构看,还是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值看,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加强清史研究。当前,要科学研判清史研究状况,强化

对清史研究的领导,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让清史研究切实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

科学研判清史研究状况

牢牢把握清史研究的话语权,首先必须科学研判清史研究状况。翻检改革开放40年来的清史研究特别是近些年的清史研究,其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清史研究日益繁荣并不断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如“过密化”“江南道路”“江南早期工业化”为代表的以科举取士、严惩贪渎、养廉等为重要内容的选官治官体系,离不开其实施的以摊丁入亩为重点的赋税改革,更离不开其审时度势所实施的以改土归流,“因其教不易其俗”为方向的边疆、民族和宗教政策。与中国古代的其他封建王朝相比,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理政能力算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特别是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出现诸多失误和错误,如政治上的僵化、文化上的专制、外交上的闭关锁国、重大决策上的失误等,这些都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带来了直接的恶果。清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可为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

当代中国是由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作为距离现今最近的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还要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究成果远远满足不了党和人民的需要,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清史研究体系仍然任重道远。

强化对清史研究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历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的引导,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后,清史学界要始终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化领导、加强规划、明确责任,牢牢把握清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努力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多智,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历史借鉴和精神动力。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摆在清史研究的首位。清史学界要对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思潮保持高度警惕,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根本利益,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二要加强理论创新,始终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清史研究体系作为不懈的学术追求。清史学界要在系统总结长期以来清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炼、创造出符合清史研究长远发展需要和国家现实需要的原创性理论,为进一步深化清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三要注意统筹规划,始终把全国清史研究的课题编制以及成果宣传转化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来抓。要克服当前清史研究中一定程度存在的闭门造车、自娱自乐问题,克服清史研究成果宣传的个体化、碎片化状态,让真正有高度、有水平、有情怀的优秀清史研究专家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加大清史研究成果的普及和转化力度,让人们正确认识清代历史,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在大众传播领域泛滥。(作者为《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

史学创新要坚持正确方法

王曾瑜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主要体现在提供新的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进展甚至开拓新的领域,形成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但从史学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没有人在创新的名义下走向反面的情况,这是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新是要突破陈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一切规矩。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经过长期发展,在微观上已经积累了一套必须遵循的研究规矩。比如,史讳、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古汉语训诂等一整套考据基本功或曰史学专门知识,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必须遵循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方能了然于胸。如果在这方面想通过“创新”来规避基本功的修炼,就会出现硬伤。例如,“邱”字是清朝为避孔丘名讳而新造的字,在清代之前并无此字。清人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名讳改古书。如果今天的学者不注意这一点,在研究清代之前的史学作品中使用诸如“雍邱县”“同邱”之类的称谓,就会成为硬伤。举此例是要说明,史学创新要有必要的基本功和细致扎实的研究,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推进史学创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史识。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近年来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史学方能创新。所谓意识形态,对治史者而言,主要是指史观和史识。自古迄今,任何史家治史均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和史识的影响。那些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主宰的人,看他们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他们本人的意识形态在主宰呢?

就治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现在,有的人为了史学创新而刻意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如此,才能分析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史观和史识不正确,创新还会出现许多乱象。比如,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污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创新”,事实上所要贬损和否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良传统。

再说一点文风问题。目前,追求文字的生僻、晦涩和朦胧甚至刻意创造一些新词,逐渐成为某些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成为其“创新”的一种表现。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需要不断创造新词。但是,新词应当含有旧词不具备或不能包容的词汇。如果词汇与旧词相同,那似乎无须多此一举。但目前有的学者以编造一大堆生僻、晦涩的新词为荣,似乎此类新词创造得愈多,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强。这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倾向。

治史者都希望求得学术上的创新,但真正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史学研究创新成果又很不易。正因为不易,更需治史者潜心努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以中国眼光看待西方史学——《西方史学史》简评

陆启宏

西方史学史一向是西方史学界的“世袭领地”,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史也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不在此山中”,反而能看得更加真切。张广智等撰写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让人们在西方史学史这一领域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该书主要有两大特点。

一是内容完备、条理清晰。该书全面阐述西方的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现代史学。对于每一时期西方史学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都有详尽论述,并将西方不同国家的史学发展状况分国别进行论述。作者注重将西方史学放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之下进行考察,层层深入、条分缕析。

二是体现“中国眼光”。该书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眼光梳理与分析西方史学,力图用“五次转折说”阐述自“荷马时代”至现代的西方史学,勾勒出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力图深入到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理解西方史学;力图从西方史学的具体文献出发,以作者的独特视角进行解读。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当前,加强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让清史研究切实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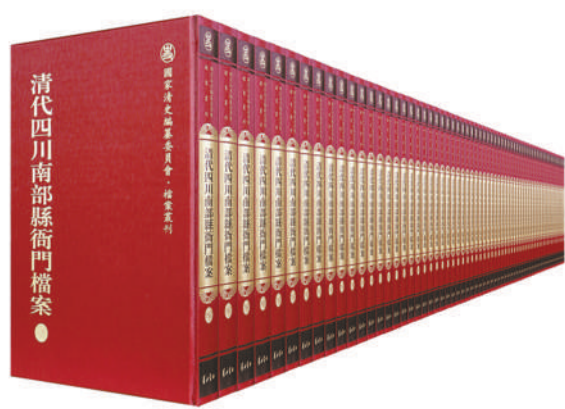
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

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如果没有建构起对清代历史的正确认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必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建构看,还是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值看,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加强清史研究。

清代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一环。清代历史,以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计,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间长达268年。在268年的时间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最高峰,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得到巩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系统总结的新阶段,《四库全书》的编纂客观上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等等。但也是正是在清代,中国经历了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巨变。清代历史早已通过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形式被中国人民所记



图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版的部分图书。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提供



本版制图:沈亦伶 马杰

深入认识史学发展规律

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繁荣发展

姜胜利

在高校设立了本科专业。接着,他们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部高质量的中国史学通史。在白寿彝主持下,原本简单的《史学史资料》升级为公开出版的《史学史研究》杂志。此后,白寿彝还撰写《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吴泽主持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1984年)等。杨翼骥则致力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的编纂。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成为日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镇。此后,大批学者承前启后,迅速展开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推出了许多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史学科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一些学者关于《史记》的研究、《资治通鉴》的研究、儒家经史理论的研究、汉魏六朝史学的研究、朱子史学的研究、明代史学的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20世纪史学的研究、近现代史家的研究、中日韩史学的比较研究等都各具特色。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传统课题持

续受到关注。如史官制度、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私家史学、正史、野史等依然受到关注,一直不乏重要研究文章。但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课题的研究并非一循旧章,而是有许多新的见解。二是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尤其注重思想、思潮、学派等。如把史学家群体以地域、时期、思想等分成流派,对乾嘉学派、浙东史学派、战国策派、疑古派、食货派、南高史学派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三是研究对象涵盖古今,尤以近代为主。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已超过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关注,从整体上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著作就有十余部,关于具体史家、史著的研究则更多。同时,还出现了以一个时期为范围的选题,如五四时期的史学、抗战时期的史学、延安时期的史学等。四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后来居上。近年来,关于侯外庐、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传记陆续出版,这些史学家的著作也重新出版。凭借蔚为大观的学术成就,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机构不断增加,专业期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学术交流也在不断加强。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

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正视问题,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是重视人才培养。当前,从师资方面看,高校里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数量还比较薄弱;从生源方面看,选择中国史学史作为专业的学生也不够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创造条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二是深化基本理论标志。基本理论的完善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基本问题。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需要不断深化研究,进一步形成共识。三是拓宽研究领域。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进行再深化,现在已经有学者对学科专门史进行总结和研究。民族史学史、文学史学史、哲学史学史、宗教史学史、民族史学史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尝试,但要真正将其纳入史学史学科体系,还需进一步努力。四是加快史料整理与出版。目前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史料发掘和整理工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对相关史料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尽快挖掘整理出版新的史料仍是一项重要任务。(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XUE YUAN LUN HENG



XIN SHU PING JIE